

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

译文集

第十三辑

(内部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

历史室编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前 言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蒙古族厄鲁特汗历史，我们拟选译、选印一些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和论文，编印《蒙古族厄鲁特汗历史资料译文集》，每辑基本上围绕一个专题，并附上有关参考论文索引，供研究、批判时内汗参考。

这是一份内汗参考资料，所选译文，有些尚有一定史料参考价值，但绝大部分都渗透了帝、修、反的反动观点。特别是近些年来苏联史学界的文章，更是苏联霸权主义猖狂反华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此项工作系初次尝试，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请见到此资料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不断提高译文和编辑质量。

引用所载译文时，务请核对原文，并注明原著版本。

目 录

前 言

- 一 十七——十八世纪清朝中国和俄国与准噶尔汗国的
相互关系及中国的历史学

Б. П. 古列维奇, В. А. 莫依塞耶夫 ----- 1

- 二 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征服

Л. Н. 杜曼 ----- 31

- 三 十八世纪下半叶清帝国入侵中亚和俄国的政策

Б. П. 古列维奇 ----- 63

- 四 清朝中国征服准噶尔的历史概述

В. С. 库兹涅佐夫 ----- 105

- 五 大汉族沙文主义和十八——十九世纪中亚各族人民
历史中的若干问题 (摘录)

Б. П. 古列维奇 ----- 119

六. 阿布泰

4. 4. 百里汉诺夫 --- 148

一、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清朝中国和 俄国与准噶尔汗国的相互关系及中国的历史学

Б. П. 古列维奇 Б. А. 莫依塞耶夫

近几年来，中国连篇累牍出版了大量的期刊杂志以及历史书籍和小册子，形成了一股大国沙文主义的反苏宣传急流。其中，以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央亚细亚国际关系史为题材的反苏文章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一方面，清帝国（1644—1911年）的政策被美化成理想化的政策，而另一方面，那些已成为满洲——中国征服者之牺牲品的非汉族人民的解放斗争遭到恶意中伤^①。因而，清朝中国与西蒙古人即卫拉特人的关系，尤其引人注意。因为，准噶尔汗国（1635—1758年）曾在中央亚细亚和东亚的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关系。

苏联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中国史学家对准噶尔汗国之命运很感兴趣^②。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中国刊物则对此问题喋喋不休，夸夸其谈，同时又歪曲俄国对卫拉特国家的政策^③。

可见，必须运用一些少为人知的史料和其它资料以恢复这一问题的本来面目。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集团对准噶尔之命运颇加关心，这与它的大国霸权主义策略是名实相符的。它妄图将清帝国的势力范围极度扩展，据说延伸到准噶尔东土耳其

斯坦和蒙古疆域以外，当时满洲——中国征服者们以强大的武力侵占了这些地区。为此，中国史学家们对卫拉特国的历史、政治地位及其与清朝中国和俄国的相互关系加以伪造，并与自己过去的评价自相矛盾。而重要的是，不论与俄国史料，还是与中国史料以及文学作品事实都是矛盾重重。他们正在批驳现今苏联历史研究著作的论矣，而这些苏联历史研究著作的合理性过去并未曾引起他们的怀疑。

正是通过被曲解的中、俄与准噶尔汗国的相互关系史，十分明显地表露了大汉族沙文主义者把中国历史科学变成了他们对人所共知的事实粗暴地歪曲，成为搞阴谋诡计的工兵。这对于北京政府是必须的，它不仅能为自己荒谬的领土要求提出“理由”，而且能对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表示大国主义的方针同时给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投下阴影。

企图把准噶尔汗国说成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使清帝国成为它的“法律继承人”，^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央亚细亚勘分俄中领土边界历史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历史“论证”，这一矣从1969年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文件中就已足见。中国的作者们千方百计地证实，卫拉特人似乎从来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在明朝时期（1368—1644年）和清朝（1644—1911年），这种相互

关系愈加巩固和发展。例如：内蒙古大学古代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文章中证实，“历史的事实昭彰，准噶尔部（即卫拉特人——作者）……自古以来和中原地区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准噶尔部从来没有形成过独立的国家。”^⑤如此断言，与历史真相有着天渊之别。

早在十四世纪末，共同的历史命运把卫拉特部落（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和全蒙古的人民联系在一起，在当时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蒙古中，卫拉特部落从一开始就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后，便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⑥在十五世纪中叶、也先统治时期，在新建立的蒙古部落的中心出现了卫拉特封建主。对与蒙古人发展贸易通商毫无兴趣的明朝统治者也像代替了它的清朝统治者一样，全然禁止中国国内诸省向蒙古人开放。这正是出现中——卫关系紧张化的一个原因。为了防止蒙古人（亦包括卫拉特人的进犯，明帝国的统治者们一方面组织进攻蒙古腹地，另一方面，沿中国的万里长城修筑了一条牢固的防御工事线。^⑦在蒙、苏史学家合著的一本著作中，作者们在概括评价明朝时期蒙中关系时写道：“他们（蒙古封建主——作者）在几十年间，在中国边境进行了不休止的侵略战争。明朝一方，企图削弱他们并征服蒙古，不止一次地对蒙古边境发动武力进攻。”^⑧

可是，由于传统的大汉族主义的概念，中国宫廷把卫拉特人与明帝国的关系视为“藩属”和“宗主国”关系，远远不符合事实真相。有关也先汗国家势力强大的情况，仅举一事实为例，即可证实：在1449年—1458年的中卫战争中，明朝皇帝朱祁镇（明英宗——译者）的军队被击溃，皇帝本人亦被俘。

十五世纪后半叶，卫拉特人开始在西部和西北部方向向东土耳其斯坦和中亚方向移动。卫拉特封建主们企图控制位于联系中国和西部贸易通路的哈密地区。在卫拉特牧地和明帝国的边界线上，局势仍然十分紧张。这些事实均证实，西蒙古各公国外交政策的积极性日趋强大。这种局势一直存在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初，当时正值蒙古以东满洲南下，形成的满洲军事封建国家——清！它加强了自己的扩张政策。

来自满洲征服者方面的威胁是促使游牧于伊犁河上游的卫拉特全权统治者哈喇忽喇及其子和多和沁·巴图尔开始为把全卫拉特领地统一于自己的权利之下而斗争的原因之一。这就使他在1635年建立了准噶尔汗国——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¹⁰⁾ 因满洲人忙于征服中国，就使和多和沁——巴图尔（他被达赖喇嘛晋封为额尔德尼巴图尔珲台吉）⁽¹¹⁾ 得以专心致力于汗国的内政。因此，在他执政的那些年，卫拉特游牧区开始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出现了最初的定居中心。⁽¹²⁾ 珲台吉是一个大权独

攬的统治者，例如，他在1644年2月，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洛维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彼此都是本国的君主。”⁽¹³⁾

中国史学家们对关于准噶尔汗国建立和巩固的事实，要么隐讳不提，要么解释为“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无耻谎言。”⁽¹⁴⁾ 隐讳不提的是，在准噶尔汗国存在的整个时期，清朝中国同它进行了无数次残酷的流血战争。例如，《历史研究》的文章断言，“准噶尔部的广大人民是热爱祖国的，许多准噶尔部上层贵族也是愿意接受清朝中央政府管辖的。”⁽¹⁵⁾

准噶尔汗国日益强大，其统治者噶尔丹——博硕克图汗（1671—1697年）力图把西蒙古人和东蒙古人（喀尔喀人）统一成为一个国家，他引起了清帝国的惶恐不安。俄国使臣H·Г·斯帕法里在1678年从北京返回时就已注意到这一来，他曾写道：“满洲人越来越耽心居住在长城（中国的万里长城）附近的蒙古人以及卡尔梅克人（卫拉特人——作者）。因为这些民族嫉妒他们，小小民族竟能统治这么大一个王国。”⁽¹⁶⁾ 那时，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主要注意力在蒙古（喀尔喀）和中国方面，但同时他还在准噶尔汗国的西部边境推行了非常积极的对外政策。

在北蒙古爆发了喀尔喀封建主的内讧，北蒙古事件导致了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初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和清朝中国的冲突。斗争初期胜负互见，最后以噶尔丹灭亡和蒙古大部归附清朝中

国而告终。嗣后，在准噶尔汗国统治者策妄阿拉布坦（1698—1727年）和噶尔丹策凌（1727年—1745年）的统治时期，卫—清战争从未间断。战争的起因，一方是准噶尔人力图对全蒙古实行控制，另一方是满洲中国征服者们打算将中央亚细亚的西北地区完全归属于己，并向哈萨克和中亚方向推进。

在十八世纪初叶和中叶，准噶尔汗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游牧国家，包括独立的准噶尔和西蒙占。除此而外，卫拉特封建主们还控制了东土耳其斯坦的大部，并竭力渗入到哈萨克斯坦、中亚和南西伯利亚的毗连地区，尽管未能获得成就，但是，他们不仅在中央亚细亚，而且在东亚的政治生活中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十八世纪初的一份俄文档案史料中对准噶尔汗国的特莫有以下的一段评述：“当前，他（准噶尔汗噶尔丹—策凌——作者）以更为强大的势力出现在印度、中国、西伯利亚、俄罗斯和波斯的全体人民面前，他拥有足够自制枪炮、弹药，还置备了充足的口粮。”⁽¹⁷⁾他是本部主要统治者，拥有辽阔的牧场，成群的牲畜，数以万计处于封建依附地位的农民，拥有十分强大的军事机构。大尉伊万·温科夫斯基曾在1722年—1724年作为俄国使臣派往策妄阿拉布坦处，据其情报所悉，策妄—阿拉布坦的部队从大约六万人，而在战争期间竟达到10万人。⁽¹⁸⁾1744年5月副大臣A·I·列斯杜耶夫—留明向枢密院呈禀：

“他是准噶尔——（卫拉特——作者）的一个统治者，拥有人
员众多的部队，并且他是一个专制统治者，他的所有臣民们都
是俯首唯命，他想做什么，人们就得无条件地执行。”⁽¹⁹⁾

在与清帝国的1715——1726年以及1729——1733年战争中
已证实准噶尔汗国的强大。清朝皇帝康熙未能以外交途径迫使
策妄——阿拉布坦承认自己是中国的附属国，便开始准备进攻
卫拉特牧地。准噶尔汗国的执政者们竭力要挽回在噶尔丹——博
硕克图——汗时期他们所丧失的立场。那时，准噶尔和清朝发生
冲突的主要地区是西芷和青海，斗争也以西芷和青海并入清帝
国版图而告终。于是满洲——中国军队便进入准噶尔汗国的东
南边境线。1723年6月13日，俄国外交代表Л. 即格，从北京
回到色楞格斯克，向外交部委员会报告：策妄阿喇布坦愿宏大
开恩惠，但仅是在新的满州皇帝雍正（1723——1735年）
不再力图使他成为“中国之附属”的情况下。策妄阿喇布坦要
求满州——中国军队撤出边境，以此作为南清帝国建立“睦邻”
关系的条件。⁽²⁰⁾ 连绵的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损失，就是清朝中
国庞大的精锐部队也不能取得战胜卫拉特人的决定优势，未能
深入准噶尔汗国的腹地。因此雍正最终还是被迫接受策妄阿喇
布坦的建议，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²¹⁾

俄国使臣С. Л. 弗拉基斯拉维奇——拉古金斯基伯爵曾

在1725—1728年与清帝国政府就双方贸易关系和俄中领土界限问题进行了谈判。1727年9月，他在给西伯利亚当局的报告中写道：“中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使他们（卫拉特人——作者）屈服，并且中国汗和辉台吉之间尚未讲和，因为中国人不归还占领的土地，而辉台吉非此不与讲和。双方通过卡伦而互相

对峙但没有战争。⁽²²⁾策妄阿喇布坦死后，噶尔丹策凌即位，形势没有发生变化。清帝国准备向准噶尔汗国发动新的进攻。1728年12月31日即格向彼得堡报告：“在中国，特别是在靠近俄国边境线的附近，一场大规模的战备正在进行，人人都希望当今博格腾汗能够全力奋起，因为不说是他的父亲，还是他本人经过多年都未使辉台吉屈服，如今则打称全力以赴来挑起这场冲突。

⁽²³⁾ 后来，噶尔丹策凌曾号召北蒙古的封建主和一些其它蒙古统治者，他写道：“你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恢复喀尔喀，青海的旧秩序与你们息息相关。朔州博格腾汗竭力要使我像喀尔喀和青海一样归属于他的管辖。并独据晋封爵位之权，把我们的领土划分成加顺（旗——译者）和苏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单位，相当于我国的县。——译者）并赐予封号，从而把我置于他的管辖之下。因此，我们要奋起斗争。我要为喀尔喀青海获得昔日自身独立而战。”⁽²⁴⁾

1731年夏，噶尔丹策凌的部队和朔州中国军队两万人，在科

布多附近发生了首次最大规模的战役，在那里，满州——中国二万人的军队被击溃。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噶尔丹策凌部队继续向东挺进，直达蒙古腹地，但1732年，在额尔齐河的额尔德尼昭寺院附近惨遭失败，溃不成军。十八世纪清朝史学家何秋涛关于这次战役曾写道：“败万尸满山谷，河水败十里（1里=0.5公里——作者）皆赤。”⁽²⁵⁾

然而，清帝国财政拮据和蒙古动乱不安的局势，促使雍正与噶尔丹策凌进行和平谈判。1734年初开始谈判，争讼十分尖锐。因为谈判的主要问题是边界问题以及蒙古阿尔泰和被满州中国军队所占领的东土耳其斯坦诸地区的归属问题。⁽²⁶⁾ 谈判的第一阶段在1737年结束，亦即雍正死后，乾隆继位（1736—1796年）。1740年初，他们才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蒙古阿尔泰山被承认为是清帝国和准噶尔汗国的边界线。卫拉特人丧失了西蒙古大部的原有领土，只保留了东土耳其斯坦的一个地区（吐鲁番绿洲）归属准噶尔汗国，并作出其他一些让步（恢复通商，以及朝圣者出入西藏的行动自由）。⁽²⁷⁾

无论是在策妄阿拉布坦统治时期，还是在噶尔丹策凌时期准噶尔和清朝的谈判过程都证明，准噶尔汗国的代表都是作为主权国和独立国的代表参加的。法国耶稣会一德教士A. 戈比里在同郎格的谈话中指出，准噶尔使者与清廷大臣进行了谈判，

“他非常傲慢，当那些当地大臣们走进他时，他迓送他们都没有表示任何敬意，并且，在他们面前从未离位站起”。⁽²⁸⁾ 应该对这样一个事实予以注意：中国始终认为外交仪式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可以推论，满州大臣们对卫拉特国家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曾有过一些高度的评价。1734年—1740年 准—清谈判的结果不仅妥善解决了双方的纠纷，而且满州宫廷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承认了准噶尔汗国的独立和主权。

当时国家独立是以君主独立的形式出现时，君主在本国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在对外关系中也具有独立自主的，从当时的国际准则之观点来看，准噶尔汗都是全权统治者，这就引起了清朝中国和俄国的注意。关于中亚和东亚的其它国家就无须再说了。因此，对史学新和共它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认为把准噶尔汗国说成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的说法是“荒谬绝伦”的这一论断，⁽³⁰⁾ 是不值一驳的。

当今的中国史学家们断然否认了准噶尔汗国作为主权国存在的历史事实，同时并百般诬蔑卫拉特人反对清帝国侵略扩张的斗争。这一斗争被说成是一场反动的和反爱国主义的斗争，虽然这是一场为捍卫自己的独立，反对强加于全蒙古人民桎梏的斗争。与此同时，中国史学家们还竭力歪曲俄国对准噶尔问题的政策，他们基于人所共知的事实于不顾，写道俄国政府于

涉了清—卫关系。关于这一点，在1975年初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中所载梁效文章的出现是首先值得注意的，这篇文章中把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说成是“民族救星”，责难他历沙皇俄国密谋勾结等。⁽³¹⁾ 庆恩也谴责俄国在十七世纪后叶的清—卫关系中充当了阴险的角色。在发表于《历史研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沙俄侵略者已直接参与了噶尔丹的叛乱。卫拉特叛军与沙俄军队采取了‘联合行动’。等等。”⁽³²⁾

关于这一点，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也同样断言，他们对满州——中国军队在噶尔丹的斗争中的军事胜利作出结论，写道：“康熙皇帝坚决维护清朝版图的统一，迅速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沙俄的侵略阴谋。”⁽³³⁾ 中国史学家们这些诸如此类的说法，歪曲了十七世纪俄—卫关系的实质。

众所周知，在开发南西伯利亚过程中，俄国人是从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以及阿尔泰山前地带推进。十七世纪最初十年，他们已经与那些首先开始深入到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上游、游牧于斋桑湖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的卫拉特人往来，被劲敌重重包围的卫拉特人开始向俄国寻求保护和避难。在邻近的俄国领域已为卫拉特人打开了一条通往西伯利亚市场的自由通路。这些市场对他们来说是如此之必要。早在1607年——1608年一

些卫拉特台吉（翁泽涅依，扎勒巴图鲁等）多次向塔拉，托木斯克，甚至莫斯科，派遣使团，请求加入俄国国籍，同意交付牲畜实物税。为此台吉请求保护他们，免遭仇敌的侵袭，要求允许他们在额尔齐斯河一带游牧。发展扩大与俄国的经济关系对卫拉特使臣尤其利益相关。⁽³⁴⁾这正是俄—卫贸易的正式开始。

1608年2月7日，曾到达莫斯科的卫拉特使臣们受到沙皇瓦西里——苏休斯基的接见。他们以自己执政者的名誉请求接受他们所管辖的乌鲁斯的居民加入俄国国籍，防范仇敌。为此目的，希望准许在奥姆河上修建一座俄国的城堡。使者们还请求允许卫拉特人沿额尔齐斯河、奥姆河、卡麦什洛夫河一带游牧，并转达了一些其它的要求。使臣们得到通知，俄国接受他们的台吉盟于自己的庇护之下，命令他们谨防好战邻国，（首先是阿尔腾汗国）。⁽³⁵⁾但是达成的协议当时未能生效。尽管如此，从那时起俄国和卫拉特双方之间形成了良好的贸易——经济关系。卫拉特人向托波尔斯克、塔拉和秋明提供牲畜、马匹、毡子、熟羊皮及兽毛换取俄国商人的衣服、布匹、金属产品和普通商品。俄国商人自己也时常来到卫拉特游牧地。俄国政府绝对地要求地方当局对卫拉特人要友好相待，避免与卫拉特人引起任何不幸和争斗。因此在1616年10月15日给秋明总督СР·С科尔里金洛夫下达公文：未经允许禁止从托波尔斯克派遣官员

惩治卫拉特人，不服从命令者将免官受惩罚，甚至处以死刑。⁽³⁶⁾

1617年底，扎勒巴图鲁台吉的使臣又一次来托波尔斯克请求臣服。翌年，4月14日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洛维奇在诏书中同意接纳扎勒巴图鲁于“沙皇陛下至高无尚的权力的庇护之下”。⁽³⁷⁾嗣后，在1619年底，哈喇忽喇（准噶尔汗国后来创始人巴图尔——琿台吉之父）的使团前往莫斯科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亦得到欢迎加入俄国国籍的奖赏信。⁽³⁸⁾

准噶尔汗国的建立引起中央亚细亚国际形势的变化。巴图尔琿台吉的政策引起了俄国的注意，他辽阔的领地与俄国土地毗邻，位于通往中国的通路上。俄国当局担心一部分卫拉特人袭击西伯利亚边境，便促使作为国家领袖之汗位的巩固，尽管那时俄国当局不仅对以和平手段把卫拉特王公变成自己的臣民。政权的巩固是与巴图尔琿台吉的利益休戚相关的，他本人表示愿意与俄国西伯利亚行政当局建立睦邻关系。⁽³⁹⁾就这方面来说，

1636年，托尔斯克非世袭贵族托米拉·彼得洛夫与巴图尔琿台吉的谈判就是这种性质的。谈判中准噶尔汗国的执政者为了得到俄国的帮助对俄国当局作出了一系列的让步。⁽⁴⁰⁾嗣后，巴图尔琿台吉还不止一次地向俄方请求向他运送必要的手艺人、家畜、武器，归根到底，是一笔巨款，作为“皇上的奖赏”。⁽⁴¹⁾这些要求大都予以满足了。彼得洛夫使团即后来俄国派到卫拉